

切入中國的問題意識」，如何「穿越西方，回到中國文化傳統」的提法，一直以來讓我這個晚生後輩頗為警醒，認為這是對當前思想界中文化熱的一種清醒，一種距離，一種反思，乃至一種糾正。但是不得

不承認，在《紐約書簡》中我看不到他用西化的眼光看中國的問題的意識，只是看到在多重文化身份的牽制下，在跨文體甚至跨語際書寫的實踐中，一位精英主義知識份子的挫敗而又無奈的幽怨眼神。

同鄉團體與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

● 張仲民



顧德曼 (Bryna Goodman) 著，宋鑽友譯：《家鄉、城市和國家：上海的地緣網路與認同，1853-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

自十八世紀末法國大革命以來，持續不斷的民族主義潮流，促成了民族主義研究的「嘉年華會」，各種民族主義論著層出不窮。自二十世紀90年代以來，在研究中國民族主義的著述中也有一批值得注意的成果，顧德曼 (Bryna Goodman) 的《家鄉、城市和國家：上海的地緣網路與認同，1853-1937》(下引此書只註頁碼) 或可屬於其中一種。

本來會館、同鄉會之類團體不過是民眾的血緣、宗族觀念與鄉土意識的反映及在異地他鄉的延續，「矧桑梓之情，在家尚不覺其可貴，出外則愈見其相親，無論舊識新知，莫不休戚與共，痛癢相關」(蘇州歷史博物館等合編：《明清蘇州工商業碑刻集》[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1]，頁350)。作為「鄉土之鏈」，會館、同鄉會和幫之類團體是鄉土中國特色和農民意識之

會館、同鄉會之類團體是民眾的血緣、宗族觀念與鄉土意識的反映及在異地他鄉的延續，同時也體現了不同地區的認同與文化差異。顧德曼探討1853-1937年間上海的會館、同鄉會之類組織及其在近代上海的政治、生活與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分析了此類組織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

寧波會館成功抵制法租界侵佔四明公所墓地，使上海居民和輿論有了「中國人」與「外國人」對立的政治意識和覺悟，認為反抗是反對洋人、伸張和維護中國權益的事情。二十世紀初年，公眾對外反抗，相繼發動了一系列騷亂、罷工、罷市以及抵制外貨的運動，其中，同鄉組織是發動民眾，捍衛中國主權的中堅力量。

具體而微的呈現，同時也體現了不同地區的認同與文化差異。作為一個飛速發展壯大的移民城市，近代上海「五方雜處，僑域之民實多於土著，故各處之旅滬者，皆立會館以通聲氣」（胡祥翰：〈上海小志〉，《上海小志·上海鄉土志·夷患備嘗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頁108）。在本書裏，顧德曼就將問題意識集中於1853至1937年間上海的會館、同鄉會之類組織及其在近代上海的政治、生活與經濟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分析了此類組織與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關係：

通過對同鄉認同在民族認同中「地位」的揭示、對民族利益和同鄉利益複雜關係的探究，我們可以修正我們對於民族主義的整體理解，更加精確地描述在中國國情下，民族主義是如何發展和運作的。我們還可以看到地方層次的機構創建中國（國）家的重要性。（頁230）

中國人濃厚的「同鄉」觀念與鄉土意識，是在異地他鄉的流動中區分「我們」與「他們」的標誌，也是凸顯鄉土認同與保持集團記憶的關鍵，似此執著的桑梓情懷曾被某些論者批評為封建、落後、封閉、保守、不夠進步的觀念，認為這種觀念不利於中國的近代化事業。話雖如此，但這並不就意味着此種同鄉情感阻礙了對一個更大的政治實體的認同和服從，並不一定就導致狹隘的地方主義和畛域之見；同鄉情感也可能會逐漸變成民族主義的代言者，顧德曼的研究就是證明：

雖然，地方情感或許會導致狹隘的地方主義，但多層次的同鄉群體的並存意味着，同鄉情感的實際範圍不僅涵蓋了家鄉的省籍觀念，而且涵蓋了更廣闊的上海大都市意識乃至對民族國家的深深關切。（頁7）

寧波會館1874年和1898年成功抵制了法租界侵佔四明公所墓地，這雖然不能表明參與者皆帶有民族主義情感，但也不能就認為它們是「傳統」的自發行為。這兩次對抗已經使上海居民和輿論有了「中國人」與「外國人」對立的政治意識和覺悟，1898年的反抗事件更被賦予了更普遍的意義，認為是反對洋人、伸張和維護中國權益的事情；儘管在現實中，問題的最終解決是清朝廷做了妥協，中方喪失了領土，但「在本地人看來，會館對法國人的勝利成了民族的驕傲」（頁123）。實際上，會館在當時的維新變法運動中也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這一時期一些主要以同鄉成員為構成基礎的學會，同樣在建構國人的主權觀念及民族主義意識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二十世紀初年，隨着中外交涉的日益增多，加上印刷媒體和知識精英的動員，公眾對外反抗的情緒也開始有了比較大的增長，相繼發動了一系列騷亂、罷工、罷市以及抵制外貨的運動。在這些運動中，「一些同鄉組織，包括有政治頭腦、有嚴密組織的寧波群體，證明是發動民眾，捍衛中國主權運動的中堅力量」（頁125）。在這裏，中國的民族主義不僅不與鄉土認同相衝突，反倒是建基於其上：

早期民族主義滲透了同鄉感情，並且是在同鄉情感基礎上形成的。在這些抗議外國各種侮辱（從傷害中國人到佔領中國領土）的運動中，政治活動家依靠同鄉忠誠以激發民族主義的愛國熱情，這些活動家（既有同鄉團體的，也有非同鄉團體的）也愈來愈能不斷把不同旅居者群體的商人、學生和工人和諧地組織到全市性的政治運動中。（頁132）

晚清民初階段，同鄉團體和同鄉感情也經歷了新生和「近代化」。民初時期，出現了揚棄舊式商業精英主義的會館而興起的同鄉會：

同鄉會拋棄會館的宗教和寡頭集團的儀式，採取民主形式，公布投票程式、會議通知、文稿函件、財務帳目，他們數次修改同鄉會章程，而與北京政府相抗衡。新的同鄉組織不再採用有中央祭壇、戲台和庭院的傳統建築風格，而是選擇世俗的多層的西式建築樣式，有演講廳、產品陳列室、報紙閱覽室、娛樂場所和辦公室，下面是拱道走廊的購物場所。（頁163）

這些改進使得同鄉會更容易吸收和動員同鄉人群，也更容易在上海的日常事務中發揮作用。在上海地區的辛亥革命中，不同地區的同鄉會曾經配合革命黨進行動員，還為革命黨及革命政府募集資金、提供經濟上的援助，並從家鄉子弟中為革命黨招募新兵。就連號稱要與傳統決裂的激進的五四運動，在上海也得到了同鄉會組織很大的回應與支援。

1927年後，在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同鄉團體的性質也發生了巨大改變。同鄉團體的勢力開始萎縮，一些同鄉團體缺乏民主機制，其背後還有幫會的介入，上海幫也於此時興起，這可以以杜月笙及其浦東同鄉會為標誌。但這也不就意味着南京國民政府時期的同鄉團體全是幫會一類的組織。這一時期，同鄉會在總體上所發揮的作用依然比較廣泛和重要，特別是在戰時的上海管理中，面對日本侵略對上海所造成的破敗局面，同鄉會配合政府甚至代替政府做了許多自救和互救的事情，還為抗日軍隊提供庇護和資金援助。

這些事例不但說明民族主義事業沒有抹殺具有地方和鄉土特色的敘述，還證明了群眾性民族主義運動往往深深植根於地方性組織的結合中。自然，同鄉會、會館之類組織並不始於近代，也並不只在上海才存在，但它們卻在近代反對外國勢力的中國民族主義的產生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而將研究視角放在上海同鄉會、會館之類組織及其體現出的地域網路和認同方面——「看似與家鄉認同相矛盾的民族認同，恰恰是由對家鄉的忠誠所促成的」（頁91），這的確是作者眼光的獨到之處。

民族主義研究的一般觀點都認為民族主義是上層知識精英的建構，這些研究通常是從上而下的角度來談問題，只注重檢討知識精英如何建構民族主義、如何發起一般民眾，卻疏於關注中下層百姓如何參與民族主義活動。顧德曼的研究就很好地從社會史和城市史層面出

民族主義研究的一般觀點都認為民族主義是上層知識精英的建構，顧德曼則從社會史和城市史層面出發，探討會館、同鄉會等中下層百姓如何參與中國的民族主義事業。不過，顧德曼可能高估了同鄉意識和同鄉團體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促進作用。

中下層民眾對民族主義認同不會有甚麼敏感認知或者投入深刻感情，在切身利益與之衝突時更會捨「主義」而取利益。二十世紀初年，天津居民已不願天津被列強交還中方治理；九一八事變後上海的抵制日貨運動其效甚微。同鄉意識也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與排他性，同鄉組織之間也許勾心鬥角，而許多同鄉會領導人實際上是亦商、亦官、亦匪。

發，參考大量的檔案資料，探討近代上海的會館、同鄉會等團體如何參與中國的民族主義事業，同鄉民眾的鄉土意識又如何與更為廣闊的民族主義感情發生反應，並將之運用到實際的對外鬥爭中等問題。顧德曼的研究揭示了一些中國民族主義研究中存在的迷思，深化了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問題研究。

不過，這裏也存在一些問題，同鄉團體誠然曾經參與和促進了近代中國的民族主義事業，可筆者覺得顧德曼可能高估了同鄉意識和同鄉團體對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促進作用。作為硬幣的另一面，民族主義很少是整個民族的民族主義，一般民眾又是如何看待和運用有關民族主義論述的？這些論述在「旅行」過程中有沒有發生「變異」？各種同鄉團體之間根據各自不同的經驗和體驗所進行的民族主義想像與表達是否存在分歧和衝突？他們又是如何協調和化解這些矛盾的？諸如此類的問題都值得我們深入地探討。

就近代中國的情況而言，我們固然承認知識精英在建構和擴散民族主義論述方面起着舉足輕重的作用，但在當時的資訊播散與政治動員條件下，知識精英甚至官方的直接影響力最多也僅及於讀書識字階層，難以穿透至一般民眾的日常思想與行為當中，「所謂天經地義、三綱五常之大法，惟上之人自喻之，而下之人初不了然也」，「見夫窮鄉僻壤之間，天子之條教，所弗喻也，官府之政令，所弗及也」（〈論革除迷信鬼神之法〉，《中外日報》第一版，光緒三十一年三月初五日

〔1905年4月9日〕）。由是可知，中下層的許多民眾對民族主義認同也不會有甚麼敏感認知或者會投入深刻感情，或可以說，無論是甚麼樣的主義或號召，一般都很難打動他們的心意和改變他們的日常生活節奏，特別是在切身利益與之衝突時，他們更會捨「主義」而取利益。以二十世紀初年天津被列強交給清政府時一般民眾的心態為例，列強在佔領天津的三年中，「每以收拾人心、振興庶務為己任」，使居住在此的中國人「一變昔日種種野蠻之自由，而為今日文明之自由」，以至居民已不願天津交還中方治理；反觀北京，列強撤退、「兩宮回鑾」後，污穢如故，惡習依舊，究其原因，「不能徒責本埠紳民之不顧廉恥、取媚外人，實由於政府之專制、官吏之壓力有以激成之耳！」（績溪胡協仲稿：〈論天津善後事宜為各國所最注目者〉，《大公報》，1902年8月7日。）再比如：在九一八事變發生之後，上海曾發起抵制日貨運動，但發現其效甚微，「一點也不可以找出些民族的意識在每個人心中」，民間甚至有「我們做日本人吧」的呼聲（岐嶽：〈我們做日本人〉，《民國日報》，1931年10月26日）。

進言之，同鄉意識也具有一定的封閉性與排他性，不同的同鄉組織及其成員都是在根據各自不同的利益和背景，以各種方式來介入民族主義事業的。在這種種不同的介入背後，也許有為達不同的甚至非民族主義的目的而展開的勾心鬥角，他們可能會以小團體利益或個

人利益為優先考量，愛鄉並不一定非要為愛國「背書」，許多人可能「但有鄉里之觀念而無國家思想」（〈論學堂之爭省界〉，《中外日報》，光緒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1905年7月24日〕）。有時，在種種名義下，他們或許會挑戰民族主義者的規劃。這勢必會影響到對一個更廣闊範圍的國家與民族的認同。於焉可知，同鄉感情與民族主義意識的接榫和轉換並非總是水到渠成的，其間也存在着斷裂甚或「博弈」。

同樣，同鄉會裏的領導人物與政府和外國勢力之間有着盤根錯節的複雜關係，許多同鄉會領導人實際上是亦商、亦官、亦匪，當政府與同鄉團體的目標一致時，同鄉會自然容易發揮效力，但當二者齟齬時，同鄉會的領導人如虞洽卿、杜月笙等又是怎麼表現的呢？諸如此類的問題都與同鄉團體參與民族主義事業之成效有關，或許作者應有所交代。

另外，須要指出的是，顧德曼的研究固然開闢了對同鄉團體的新的認識路徑，但尚未深入探討具體的個人（不是同鄉組織中的精英人物）如何參與民族主義活動等事宜——是被動地服從於同鄉組織的領導與媒體的動員抑或是主動加入？換言之，在整個民族主義大潮中，一般同鄉民眾的主體性何在？因為在實際的鬥爭中，同鄉團體的力量是作為集體、集團的形式來展示的（當然只有這樣才能更好發揮作用），而民族主義「一定得從平民百姓的觀點分析才能完全理解。也就是說，要探討一般人的假想、希望、需

求、憧憬和利益，當然這些不全然與民族有關，或沒有那麼強的民族性」（霍布斯鮑姆 [E. J. Hobsbawm] 著，李金梅譯：《民族與民族主義》〔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頁11）。顧德曼說：「同鄉會在整個民國時代的活動顯示，是這些群體而不是市民個人，構成更新、更著名、更加理性的政治和商業組織形式的要素，包括商業和行會、職業團體。」（頁216）之所以如是強調，是由於作者認為「現代性不應該是我們用來衡量中國（觀察中國的差異）並發現其不足的一種超然的抽象、得自西方經驗的一種飄忽的目標」（頁227）。但起源於西方的現代性已經大大改變了近代中國，並成為近代中國歷史演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已充溢於我們的日常生活和思維方式當中，讓我們揮之不去，我們又怎麼可以採取非歷史的立場，放棄這個比對？近現代中國的問題大概只有在西方「出席」（presence）的參照下，才可以得到很好的解釋與理解。

相比於西方，中國是一個缺乏現代國民意識的國家，晚清人士反覆指責的國民弊病之大端是國家思想之欠缺。近代知識份子根據現實和新的思想資源對之做了大量的檢討，並為喚醒國民做了諸多嘔心瀝血的努力。由此就產生了如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所說的弔詭現象：「二十世紀早期的中國，其特徵是它作為一個弱國家，但卻有強大的國家主義論述。」(Prasenjit Duara, *Rescuing History from the Nation: Questioning Narratives of Modern*

顧德曼認為現代性不應該是用來衡量中國並發現其不足的一種超然的抽象、得自西方經驗的一種飄忽的目標。但起源於西方的現代性已經大大改變了近代中國，並成為近代中國歷史演進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充溢於日常生活和思維方式當中，揮之不去，我們又怎麼可以採取非歷史的立場，放棄這個比對？

絕大多數同鄉會個體在整個同鄉團體的活動中也是處於「失語」狀態，屬於被支配、被宰制的角色。究竟他們的真正想法如何？個人又是如何參與或抵制同鄉團體事業的？出於甚麼動機？本書對此的討論語焉不詳，亦迴避或者說沒有涉及女性在同鄉團體活動中的角色。同鄉組織中女性的位置何在？其聲音是否遭到有意識的控制與強迫？

Chin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170) 有着這樣的論勢，再加上其時中國面臨的杌隉形勢和「政權建構」(state-making) 以及「民族建構」(nation-building) 的壓力，個人的主體性自然要聽命於群體和國家的需要，要被納入到民族主義的統制之下，「今之所急者，非自由也，而在人人減損自由，而以利國善群為職志」(嚴復：〈民約平議〉，載王栻主編：《嚴復集》，第二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337)。為解救民族危亡和實現國家富強，民眾自然要合群，惟有群體和國家的利益有了保證，才會有「小我」的幸福在，「求國群之自由，非合通國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愛國，人人於國家皆有一部分之義務不能」(嚴復：〈《法意》按語·八十二〉，載王栻主編：《嚴復集》，第四冊〔北京：中華書局，1986〕，頁981)。必要時甚至要「絀己以伸群」，「若夫有時為國家生存發達之必要，不惜犧牲人民利益以殉之。……非惟民瘁而國不能榮。抑國不榮則民亦必旋瘁」(梁啟超：〈政治與人民〉(1907年)，載《飲冰室文集之二十》〔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頁7)。簡言之，個人的價值和生存意義依然有待於國家這個「利維坦」(Leviathan) 的裁判，其帶來的後果則是個體的國民(不管是在身體上或是行動上) 依舊是被國家(主要是國家的統治者) 支配和宰制的對象，個人的自由、解放和全面發展依舊遙不可及，儘管這種國家主義論述對國民觀念在近代中國的普及不無掃除

奠基之功，也大大改變了社會大眾的心理意識與政治行為(沈松喬：〈國權與民權：晚清的「國民」論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七十三本第四分〔2002年12月〕，頁717-26)。但歷史的經驗也證明：「國家至上」及由此所衍生的相關「政治正確」論述，有時也會成為統治者專制愚民、摧殘人權的招牌與遮羞布，這個後果同樣不容忽視。再把此道理推延及同鄉團體與其成員之關係，絕大多數的同鄉會個體在整個同鄉團體的活動中也是處於「失語」(voiceless) 狀態，一樣屬於被支配、被宰制的角色。這其中，他們雖不得不接受外部的動員和控制，但也許會透過別的方式表達自己。究竟他們的真正想法如何？他們個人又是如何參與或抵制同鄉團體的事業的？是出於甚麼動機？可能由於材料的限制，以致於本書對此的討論語焉不詳。如能有幾個關於一般同鄉會成員是如何與同鄉團體互動的個案介紹，或許本研究將更深刻、更具有說服力。

抑有進者，如論者所指出的那樣：大多數關於民族和民族主義的權威理論，都忽略了兩性關係與之的相關性；大多數的民族主義論述都不把性別作為一個主要的命題看待，都不關注民族主義對於男人與女人的不同整合，都把女人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隱藏」起來(參看伊瓦一大衛斯[Nira Yuval-Davis]著，秦立彥譯：〈性別和民族的理論〉；沃爾拜[Sylvia Walby]著，吳曉黎譯：〈女人與民族〉，兩文均收於陳順馨、戴錦華選編：《婦女、民族

與女性主義》(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2004)，頁1-40、69-97)。顧德曼的研究亦同樣迴避或者說沒有涉及這些問題。或許在同鄉團體的活動中，女性的角色的確不那麼「顯赫」，但這是否就意味着在同鄉團體發起的民族主義行動中，她們只

是旁觀者或被動的追隨者？同鄉組織中女性的位置究竟何在？其聲音是否遭到有意識的控制與強迫？類似的問題都值得我們關注，而顧德曼的研究卻未能「再現」她們的些許聲音，這也可說是本書的一個缺憾。

《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目錄

2006年8月號、9月號

第53期 2006.8.31

- 許順富 湖南紳士與清末教育變革
 蔣寶麟 民國鄉村建設運動：「政教合一」及其悖論——基於對晏陽初「定縣實驗」的考察
 張建華 季諾維耶夫：蘇維埃體制「最無情的批判者」和「最後的守護人」
 張立濤 村民自治的法理依據研究
 鄭衛東 一個魯東南村落在二十世紀上半葉的社會概況：實證研究
 潘學方 試析農村股份合作制與集體所有制衝突的法律困境——以浙江省台州市椒江區為例
 陳波 關於西藏：文化、政治和知識是誰搞臭了後現代
 曹怡平 後現代之後——社會科學的悲劇與鬧劇
 劉進 關於「雙重曲解」的回覆——答施用勤先生
 杜應國 關於「雙重曲解」的回覆——答施用勤先生
 岳永逸 我們是誰：時空位移中民族性的迷失——《自我的他性》讀後

第54期 2006.9.30

- 申曉雲 文革中毛、林之爭的初次交手——武漢「七·二〇事件」真相
 董國強 從南京大學「倒匡」事件看「文革」的複雜屬性與多重面相
 何蜀 「文化大革命」中的「活人展覽」
 劉繼明 回眸五七幹校
 戴韶華 對勞教制度的發展歷史及其現實困境的政治思考
 曹瑞濤 通向毀滅的改良之路——對伊朗「白色革命」失敗的反思
 張濤甫 中國傳媒改革動力機制分析
 石衡潭 同一個空間，不同的世界——賈樟柯電影《世界》觀後
 吳德淳、林鴻鈞 哪有那麼複雜——淺析楊德昌的《一一》(1999)
 趙春 「異化」的詠歎——「蟬」的蛻變
 杜應國 莽蒼天地一書生——讀《田家英與小莽蒼蒼齋》

圖片來源

封面 許江：《大北京·大城樓之一》(局部，2001)。
 封二 許江：《移動的山之二》(2005)。封二文字：金觀濤。
 頁31、34、35、114、130 資料室圖片。
 頁95 許江：《古剎老樹》(2003)。
 頁97 許江與他的作品。
 頁98上 許江：《葵園十二景·西風瘦》(2005)。
 頁98下 許江：《葵園十二景·安公子》(2005)。
 頁99上 許江：《葵園十二景·水雲間》(2005)。
 頁99下 許江：《葵園十二景·回春堂》(2005)。
 頁100 許江：《歷史的風景之黑紅金》(2000)。
 頁104、106 作者提供。
 頁129 阿倫特(Hannah Arendt)著，王凌雲譯：《黑暗時

代的人們》(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6)，封面。
 頁139 傅勒(François Furet)著，孟明譯：《思考法國大革命》(北京：三聯書店，2005)，封面。
 頁144 邁斯納(Maurice Meisner)著，張寧、陳銘康等譯：《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與烏托邦主義》(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5)，封面。
 頁149 張旭東：《紐約書簡》(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6)，封面。
 頁153 顧德曼(Bryna Goodman)著，宋鑽友譯：《家鄉、城市和國家：上海的地緣網路與認同，1853-1937》(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封面。
 封三 許江：《歷史的風景之柏林》(局部，2000)
 封底 許江：《大北京·故宮之一》(2000)。